

图书馆

Qushihui

G

S
H
U

谈

文学



朱光潜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

读完该书，可以使读者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来理解文学，对于鉴赏和写作都有益处。

图书馆



Gushihuitushuguan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谈文学
朱光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文学/朱光潜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故事会学者讲坛)

ISBN 7-5321-2043-0

I.谈… II.朱… III.文学理论 IV.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170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谈 文 学

朱光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插页 1 字数 117,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043-0/I·1662 定价:9.00 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羨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藉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溷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

吴中杰

如果说,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那么,朱光潜可算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建筑师。开拓者引进了西方的美学观念,推动了古今美学的嬗变,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很多文化拓荒工作要做,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还要为文化革命披荆斩棘,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没有放在美学上,因而来不及系统地构筑新的美学体系。而比他们略晚一些时候的朱光潜,则可以专于一业,他终生潜心于美学,系统地译介西方美学理论,并且构筑了第一个较完整的美学体系。

朱光潜,字孟实,生于1897年10月14日。安徽桐城人氏。有清一代影响极大的桐城派古文,就发源于他的故乡。朱光潜的父亲虽然教他做策论经义,但他进入中学以后就

受到了古文派的教育。因此,他读了很多古书,且做得一手好古文。但那时,新学的影响已经很大,梁启超那酣畅淋漓的文章,使他深为感动,并且促使他窥探外面的世界。1916年冬天,朱光潜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了半年小学,便到武昌进高等师范学校。但武昌高师中文系很使他失望,这里的师资力量还不如桐城中学。恰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要选派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朱光潜就应选而去,时在1918年。香港那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整个教育体制是西化的,朱光潜在这里不但补习了英语,而且广泛地接触了西学,这使他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为今后的深造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1923年,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任英文教员,同时兼任上海大学逻辑学讲师。这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新文化阵营明显地分化,朱光潜对左右两方面的人物都有所接触,但却尽量回避卷入斗争,他只想通过教育的方法来改良社会。但是,因江浙军阀的战争,他所供职的中国公学停办了,他只好另谋他就。自然,他所能做的,仍是教育工作。因夏丏尊的介绍,他转至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颇有影响的几位朋友: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等,在他们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白马湖虽然风景优美,但也并非世外桃源,不久就起了一场风波。原因是匡互生想有所改革,却不为专制的校长所采纳,愤而辞去教务主任之职,引起很大的反响。朱光潜支持匡互生,也辞去教职,回到上海。后来,夏丏尊、丰子恺等人也赶到上海,再加

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等人，他们创立了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虽然在立达学园开办不久，朱光潜就考取官费赴英留学，但开明书店却与他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长期为该书店的《一般》杂志（后改名为《中学生》）撰稿，而且许多著作都在这个书店出版。

朱光潜是在 1925 年夏取道前苏联到英国去的。先进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欧洲古代史。在哲学思想上，受康德、尼采、克罗齐的影响很深，这都是当时的流行哲学。3 年修业期满，他又进伦敦大学就读，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旁听。1931 年再转至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直至 1933 年他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才回到国内。他在欧洲滞留了 8 年。在留学期间，朱光潜除读了许多西洋书籍，研究了许多新的学问之外，还不断写作。他一到英国，就以通讯的方式，在《一般》杂志上与国内青年谈思想修养和人生态度，这些文章于 1929 年结集成一本书，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名，在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以浅近的文字和恳切的态度，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印行了几十版，成为一本畅销书。接着，他又于 1930 年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2 年出版了《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且写成了《文艺心理学》的初稿和《诗论》的纲要，这是他前期的两本代表作。而对于自己的主要著作，他却非常慎重，并不急于出版，回国后作为教材，边教边改，改得比较成熟了，这才付印。——《文艺心理学》是 1936 年出版的，《诗论》直到 1943 年才出版。

正是在8年留学期间,朱光潜终于选定了他的治学方向:美学。这个方向的选定,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入手,必然会走到三者的交叉点——美学上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正如他在《谈美》一书中的《开场话》中所言:“讲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感情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可见朱光潜选定美学为自己毕生事业,目的还是要净化人心,救治祖国,并非完全出于某种学术兴趣。

1933年,朱光潜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兼课,教的就是“西方名著选读”、“西方文学批评史”、“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课程。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海之争”。所谓“海派”,原是指受商品经济影响较深的上海文人,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以上海为基地的左翼文人,也被指斥为“海派”。而“京派”则是指当时聚集在旧都(原为“北京”,时称“北平”)的一批文人,他们追求文学本身的趣味,而与新的革命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处于某种对立的地位。朱光潜由于经历和人事的关系,自然属于“京派”的圈子,而且由于他刚刚回国,没有历史的纠葛,被推出来主编“京派”刊物《文学杂志》。这一经历对他日后

的生活影响颇深。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教于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他仍回北大，任文学院代理院长。在四川，他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教育部派 CC 派特务头子程天放当校长，并且写信给周扬，表示想到延安去；但后来被王星拱、陈通伯拉去当了武汉大学教务长之后，却又迫于国民党关于“长”字号人物都要入党的规定，加入了国民党，并为他们的《中央周刊》写稿，而且被列名为中央监察委员。因为这个缘故，解放前夕，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斥之为“蓝色文艺”。“蓝色”者，指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也。其实，朱光潜与蓝衣社毫无关系。他之被列名为中央监委，无非因为是名流，被拉去当作点缀品，这种事是所在都有，不足为奇的。作为一个学者，朱光潜一生都在教学和写作。除上面已提及的外，解放以前他又陆续出版了许多著作，计有：《变态心理学》（1933 年）、《孟实文钞》（1936 年，1943 年又增订为《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1946 年）、《谈修养》（1946 年）、《克罗齐哲学述评》（1947 年）。

40 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于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战后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官僚政府的加速腐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当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许多原属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抢运黄金、文物的同时，也有一个

抢运人才的计划。朱光潜是名流，自然属于抢运之列。但是他拒绝南飞，留在北平，迎接解放。郭沫若的文章，在解放初自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好在当时贯彻统一战线，而且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对他也还比较了解，所以朱光潜的日子还算好过。

但思想改造的冲击是难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认为带有旧思想，不适应于新社会，需要加以改造，何况朱光潜有着那样的经历，又从西方美学家汲取养料，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更是属于重点改造对象。朱光潜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倒也十分认真，他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检查自己的美学观点，并在1956年发表了自我检查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章发表后，照例被一些“左”派理论家认为不深刻，需要进行批判。但不久，这次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运动却演变成为一场持续六七年之久的美学大辩论。这当然与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提出有关。“双百”方针的提出，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惜的是“齐放”、“争鸣”却总是为“批判”所代替。这场美学讨论可算是个异数，虽然仍旧有人喜挥棍棒，不时飞出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但总算还允许别人反驳，所以讨论尚能进行下去。这一方面是因这场美学讨论始终是在“美”和“美感”、“主观”和“客观”的抽象理论范围内进行，与现实文艺运动关系不大，不像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是直接针对当前文艺问题而发，对文艺界要产生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双百”方针既然提出来了，

总得要树个样板，在人文学科内，由于上述情况，美学讨论无疑是最宜于做样板的。

作为争鸣的一方，朱光潜本人却是相当认真的。他利用当时所允许的条件，几乎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说，他是“用足了政策”。当然，他不是强辩，而是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坚持着他自己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修正他已认识到了的错误。并且在这场讨论中，重新建立了自己新的美学理论——虽然别人指责他仍旧是唯心主义的，但他自信自己的美学理论已经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了，是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论。作家出版社曾将他 1958 年以前的论辩文章集为《美学批判文集》，给予出版。

在这场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朱光潜开始了“西方美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他谦称自己过去对西方美学史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但他早年讲授过与此相近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资料是熟悉的。这回他是运用自己新的美学观点来研究，当然又别有一番见解。恰好 60 年代初周扬受命抓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就把编写《西方美学史》的任务交给了朱光潜。朱光潜不辱使命，很快写成，于 1963 年和 1964 年相继出版《西方美学史》上卷和下卷。大概是由于“大跃进”时期强调集体编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的上卷还是署“朱光潜主编”，到下卷出版时才署“朱光潜著”。从这个细节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时代的风尚。《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后期代表作，对我国美学界影响很大，就朱光潜的学术成就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但接着，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批判时代。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指示下达之后，整个文艺界和学术界都展开了批判活动。不过这一回美学界的批判对象不是朱光潜，而是周谷城。批判的重点是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朱光潜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动员出来批判周谷城。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说是要与周谷城对对笔记。但朱光潜的批判是严肃的，他没有乱扣帽子，而是找出了周谷城美学思想的来源，与他进行学理上的讨论。

不过，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是一个玉石俱焚的时代，朱光潜自然是在劫难逃。等得“文革”结束时，朱光潜已是79岁高龄。但他在80岁之后，直到89岁（1986年3月6日）逝世之前，仍旧笔耕不辍，又出版了《美学书简》（1980年）、《美学拾穗集》（1980年）、《艺文杂谈》（1981年）、《维科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1984年），并且修订出版了《西方美学史》。此时，朱光潜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提出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相当尖锐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

同时，他抓紧时间修订旧译，着手新译，为中国的美学建设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朱光潜这一生，翻译的西方美学名著很多，如：克罗齐的《美学原理》、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以及晚年新译维科的《新科学》等。他可以说是为中国的美学建设，贡献了一生的精力，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朱光潜虽然是美学专门家，长于思辨，但却不是一个学究式的人物。他关心社会生活，喜欢与青年对话，谈修养，谈美，谈文学，非常贴近现实。这本《谈文学》，就是这位美学家与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谈话。它不是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但有内在的连续性；它不是文学入门书，但许多地方是为初入门者说法；它不摆理论文章的架子，但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学理修养，所以写得很有理论深度，只不过作者的文风一向是深入浅出，再加上文中有许多自身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所以读起来很有亲切之感。

本书是作者在抗日战争末几年所写，具有当时文坛的现实针对性；它属于作者前期作品，也必然带有前期的文艺思想印记。但是，攻击时弊的文章，只要此种弊病尚存，它就会保持自己的生命。比如，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中，“关于作品内容”方面，作者批评了五种类型：“第一是侦探故事”，“其次是色情的描写”，“第三是黑幕的描写”，“第四是风花雪月的滥调”，“第五是口号教条”；“关于作者态度”方面，也批评了五种态度：“第一是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其次是憨皮厚脸，油腔滑调”，“第三是摇旗呐喊，党同伐异”，“第四是道学冬烘，说教劝善”，“第五是涂脂抹粉，卖弄风姿”。这些批评意见，至今仍值得思考。当然，对于朱光潜的这种批评，当时就有人持反对意见，目前更会有许多人不能接受。特别是在作品内容方面的第五条和作者态度的第四条中，朱光潜否定文艺的实用目的，反对将文艺作为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就被革命文学家作为批判的靶子。其实，细审朱光潜的议论，倒是不无道理的。他认为艺术创造是

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而教训人则是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这两桩事不能合而为一。“一箭射双雕是一件很经济的事，一人骑两马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拿文艺做宣传工具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从美学看，创作和欣赏都是聚精会神的事，顾到教训就顾不到艺术，顾到艺术也就顾不到教训。从史实看，大艺术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在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可见朱光潜并不否认文艺有教育作用，只是反对存心以文艺作品去教训人。这种见解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虽然政治家们总喜欢以文艺为宣传工具，但一被存心当作宣传工具，作品也就失却了艺术感染力。鲁迅早就说过：“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雏颂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三闲集·怎么写》）可见深知艺术三昧者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把侦探故事当作低级趣味来看，对时下强调文艺的娱乐性和消闲性的读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朱光潜并没有否定侦探故事本身，而是否认它是文艺作品。因为“它们有如解数学难题和猜灯谜，所打动的是理智不是情感。”——原来朱光潜所谈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艺，这种文艺到了最高境界，可以与“道”相通，即所谓“文以证道”。它并不排斥理智，因为它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但极重情感，它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趋势的同情，有冲突化